《啼笑因緣》的另一解讀——女性隱喻與知識分子的妄想寓言

陳顥程*

摘要　本文提出《啼笑因緣》當中的女性隱喻，指出男主角和三位女主角並不是純粹的、鴛鴦蝴蝶派的愛情故事，而是另存有另一解讀——即五四主流常見的文學敘事，分別是軟弱但熱血的男知識分子，他們多數扮演無力的救世主；以及象徵家國母親的女性，和當時的中國一樣，雖受西方文化、知識分子影響，但卻最終淪為無力掌控命運的悲劇人物。樊家樹看似主動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實則無力改變三位女主角的命運，而他對三位女主角的感情和結局“都蘊涵了作者對傳統文化在現代之失落的一種惋惜、回顧的複雜心態”[1]，反映了當代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審思和張恨水個人對知識分子的妄想寓言。藉著對《啼笑因緣》的再解讀，本文期望打破對鴛鴦蝴蝶派解讀的局限。

關鍵詞　《啼笑因緣》　知識分子　女性地位　革命文學　鴛鴦蝴蝶派

一　前言

與五四文學主流相比，鴛鴦蝴蝶派雖然在八十年代翻案了，[2] 可是卻一直處於很尷尬的位置，在海外一直不受重視，[3] 在現代文學中以“通俗文學”的身分勉强佔了一席之地，但“不夠新”、“商業化”的標籤一直讓它們難登大雅之堂，[4] 以至於在文學場域中被邊緣化。可是，隨著華語語系理論的提出，[5] 連電影、音樂等大衆藝術也加入到學術討論裏面，它們的“中國想像”等要素也被談論，鴛鴦蝴蝶派的框架是不是也能有開闊的空間？

---

*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語言文學。

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94。

2　參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便為了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人翻案，或者說發現吧，可是也遺漏了鴛鴦蝴蝶派的討論。

4　侯如綺：〈尋找位置——鴛鴦蝴蝶派作家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27 期（2013 年），頁 113、123-130。

5　近年，學者特別注意到華語語系的討論，不只包括文學，甚至電影還有音樂，如學者史書美(Shu-mei Shih)著，楊華慶譯的《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便討論了李安的父親三部曲，王德威的《史詩時代的抒情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也有相關討論。

特別是《啼笑因緣》還一直被翻拍成電影、劇集，其中的思想滲透力遠比純文學高，屬於不斷與當代生活融合、站在大衆中間的藝術。隨著西方思想流入，晚清開始出現的報章體令小說發生商品化，[6] 加上湧現的大批讀者，令晚清時期成為文學史的轉捩點，中國文學也隨之暗起“迴轉”，[7] 在敘事時間 [8] 、角度 [9] 、結構 [10] 出現改變，鴛鴦蝴蝶派正是承接舊文學和新思想的那道橋樑。當時的大衆未必懂得欣賞知識分子的先鋒文學，可是生活在這麼一個國破家亡的大革命時代，他們的閱讀興趣和作者的創作理念真的能夠與社會完全割裂，不留一絲痕跡嗎？二戰時的荷里活，雖然說是為了市民提供安慰、娛樂，但其代表作《北非諜影》也脫離不了時代的影響。因此，我們不應抹殺《啼笑因緣》在文學史、思想史中和革命文學相提並論的可能性。

事實上，如果說對女性的審判，最早的恐怕不是丁玲、張愛玲等女性作家，這種奇特的女性描寫在《啼笑因緣》中也出現過，例如貪慕虛榮的鳳喜，她所想的真如樊家樹想的那般好嗎？前半部分表面上好像是樊家樹和鳳喜互生愛慕，但又偏偏埋下伏筆——鳳喜讀了書後，要求樊家樹給她買東西（包括自來水筆和玳瑁邊眼鏡），要求買這些多餘的東西難道不是她虛榮心在作祟嗎？書中無論是何麗娜的心理描寫，還是關秀姑對樊家樹的暗戀，作者都能敏銳捕捉女性心理，但又沒有過分神化她們，這雖然與一衆男性作家不同，但這個榮譽卻永遠只能派給女性作家。

如果說《啼笑因緣》是一部審判女性的作品，但其中對樊家樹的批判，又使得它帶有魯迅審判知識分子一樣例如他嫌棄鳳喜的家，覺得她有點放蕩，所以把她送進學校，這又似乎在描寫一個知識分子一廂情願拯救弱女子的故事。事實上，這種解讀也不是不合理的，五四作家本來就有把女子連接到國家、文化的傾向，錢理群也注意到《啼笑因緣》的矛盾，提出樊家樹對三位女主角的感情和結局“都蘊涵了作者對傳統文化在現代之失落的一種惋惜、回顧的複雜心態。”[11] 因此本

---

[6]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2-73。他提到雖然中國不比世界各國的出版事業，“清末民初的小說仍可稱為空前的繁榮。起碼在 14 年間（1898-1911 年）出版的小說比前此二百五十年出版的小說總數還要多。”

[7] 參王德威著，國立編譯館、宋偉傑等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52-58。他提到晚清小說是一場未完成的試驗，而非全面的脫胎換骨。這種迴轉同時出現在五四後，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在搖擺，一方在社會和政治上效力，一方尋求創造自主性。

[8] 陳平原提到其中敘事時間的改變最早，五四作家已適應和習慣了倒裝、交錯敘述的說法，不再像老前輩一樣炫耀。（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2-53、58-59。）

[9] 陳平原提到敘事角度的改變，由古代白話小說的全知說書人的角色，到限制敘事、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出現和交叉運用。（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63-99。）

[10] 中國作家開始出現不同的突破，傳統的情節開始退位，氛圍和背景描寫及人物心理成為五四作家主軸，亦因此開創了獨白體。（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00-134。）

[1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 294。

文提出，除了對女性、都市的描寫，《啼笑因緣》解讀為政治寓言，[12] 並透過分析三位女角的情況和她們各自在樊家樹心中的隱喻，去討論《啼笑因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妄想破滅的、審判知識分子的故事的可能性。[13]

二　三位女主角的象徵和樊家樹的態度

樊家樹作為一個大學生，本來就有知識分子的身份，可是他是一個像高覺慧的知識分子，要是說他封建，他又和江湖人物關壽峯交往；要說他開放，他又嫌棄鳳喜“溫柔之中，總不免有一點放蕩的樣子”，而且他幫助她讀書只是為了讓她能上大場面，覺得她會“知恩圖報”。樊家樹批判他的表兄看不起關壽峯，自己其實也看不起鳳喜一家，他的本質就是一個半僞君子的書生，而他對三位女主的態度似是有情，卻又不純潔，這種情況就像在男性視角下物化女性，只是三位女主對他是一樣的。

先說沈鳳喜，她和關秀姑同樣來自下層社會，她雖然是功利的，樊家樹卻最喜歡她，覺得她是最清純的。他們牽起紅綫的原因其實是樊家樹給她家錢了，這本來就不是純正的來往。沈大娘和她都知道自己讀書的目的。雖然說她後來好像有過動搖，但也算不上是因為她個人或者他倆的回憶而改過的，而是因為看見了雙璧仁這對情侶，而醒悟過來自己不想嫁“一個黑不溜秋的老粗”。那麼如果劉將軍也是雄姿英發的少年，豈不是這點迷惘都沒了？實際上，她決意跟了劉將軍後還給樊家樹的那四千塊錢，反映了她對樊家樹根本沒有情愛可言，交換的也只有利益。當樊家樹說他的家當有二三萬塊錢，她卻回應說劉將軍給了她五萬塊錢。歸根究底，樊家樹對她的不離不棄也是盤算，鳳喜比關秀姑好看，又比何麗娜“天真”，可是她最後卻瘋魔了。總之，無論是樊家樹還是沈鳳喜，他們互相對對方總有一絲不純，作為第一男女主角，這樣的設定很不“言情”。

再說關秀姑。關秀姑和樊家樹的交往也有物質成分，關救了她的父親關壽峯，這也是秀姑一開始會誤會的原因。雖然表面上一直是關秀姑單戀著樊，可是樊也有過念頭的——“他想到她手臂，溜圓玉白，很合乎現代人所謂的肌肉美。這正是燕趙佳人所有的特質，江南女子是夢想不到的。心里如此想著，卻又不免抬了頭，向秀姑抱在胸前的雙臂看去。”但是他又嫌棄關秀姑的樣子不如鳳喜——“看著鳳喜那樣含睇微笑的樣子，覺得她那嬌憨可掬的模樣兒，決不是秀姑那樣老老實實的樣子可比。”而在十四回中，他看到何小姐聯想到關的時候，“她乃另是一種女兒家的態度”，無端端的又要拿她們二人比較，這是沒起心思嗎？還

[12] 實際上，《老殘遊記》也有它的政治解讀，作者覺得在這一個大革命的時代，張恨水還不是張愛玲，生活在另一個地方，他自己本人也有過不少的愛國散文，所以要把他完全和革命主流斷裂起來其實不太有理。

[13] 一個像魯迅《傷逝》的故事。

有，既然樊的閑錢這麼多，為什麼沒有提出讓關秀姑讀書？《啼笑因緣》一般被定義為一男配三女的言情故事，但上述的比較卻顯示出樊家樹對鳳喜是見色起意，鳳喜對樊卻是最一往情深。

最後就是和鳳喜相似的何麗娜。雖然一開始何麗娜也不過因為新鮮所以“喜歡”上樊家樹，但終究是樊家樹怕高攀不起，在舞場的第一印象就是覺得她奢侈，其實他給鳳喜的錢也不少，不過何麗娜本就比他富有。他自言不喜歡何麗娜的原因是嫌棄，其實就是怕融入不了、高攀不上。既說她沒有沈鳳喜的處女、自然之美，是一個冒充的外國小姐，又說她“交際場中出入慣了，世故很深。男子的心事怎樣，她不言不語之間，就看了一個透。這種女子，好便是天地間惟一無二的知己，不好呢，男子就會讓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可是何麗娜心地並不壞，她沒有經濟的考慮，反而是最純真、最一心一意對待樊的人。例如，她曾在樊母病重時送他人參，又去火車站接送他，反倒是樊家樹對她的猜忌心最重。

比較三位女子，她們其實各有相似之處：出身背景，關、沈相似；容貌，沈、何相類；對樊家樹心思純，關、何一樣；思想上，沈、何都接觸了西方的思想。特別是思想這一部分最值得分析，雖然說沈鳳喜是社會下層，但是她拋棄了傳統價值，交換金戒指在傳統意義上就是私定終身了，但她拋棄了傳統女性價值，投向了現代物質主義，在“傳統價值現代物質主義”兩極之間搖擺。沈鳳喜雖然好像比何麗娜傳統，可是她女學生的身份，其實半受過啓蒙了。

回歸到我所說的政治寓言解讀的可能性，可以說，關秀姑象徵古舊的中國文明，不受一點西方思想“污染”，何麗娜象徵著全盤西化的文明了。那麼作為知識分子的樊家樹最迷戀誰的，是兼併了以上兩女特徵的沈鳳喜。樊家樹出錢資助她讀書，可以解讀為知識分子啓蒙大眾的努力，可是樊從來沒有了解過沈。沈想要的從來不是知識，而是金錢，最後還要靠象徵舊文明的關姓父女拯救了她，可是沈鳳喜卻又瘋魔了。而樊家樹最初嫌棄的兩個女性，最後又都離開了。無力的知識分子最關懷的自然是疲弱的下層社會，因為這會帶來極大的滿足感。樊雖然很傾慕象徵上層社會的何麗娜，可是他因深知自己無能而自卑。關秀姑善良但不夠好看，又被他嫌棄。只餘下沈鳳喜能滿足樊家樹的美夢，可是終究夢一場，樊家樹就算送了沈去讀書，他也啓蒙不了她。如果他一早資助的是關秀姑，可能早已結成良緣。小說對這三位女子的安排、設定，不但形成了有趣跌宕的言情故事，也提供了政治寓言的新視角——將該書解讀成批評知識分子的隱喻故事。[14]

[14] 這部分需要更多的探討，可是論文的字數有限。當然，這部小說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例如就是它的武俠想像和古典小說還有後來流連港台的武俠小說脈絡也很值得再寫，可是字數有限就沒辦法探討。

三　結語

本文提出這個政治寓言的解讀視角，分析尚有不足之處，可是仍希望藉著這個嘗試為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研究提供新的綫索和角度。過去常把通俗文學和知識分子的雅文學完全割裂開來，它們彷彿是在不同空間下的作品，這樣便忽略了它們在同時同地互相影響的可能性，所以這可能只是另外一個文學批評場域內部被製造的五四主流。[15] 五四思潮中一方面說要為大衆創造，甚至學界亦在重提某些作品現代文學產生的啟蒙作用，但是，如若忽略通俗文學中有影響力的作品，那也不過是多一批象牙塔的作品，對文學創造者也是不利的。既然通俗文學的脈絡能連接到晚清小說，而且其中也存在影響革命文學的因素，那麼它的“現代性”不容忽略。因此，無論是通俗文學或是革命文學，五四時期的文學與文學商品化等現代化發展是互相構成且互有關聯的，在這個背景下，通俗文學也能變得“政治”起來。

雖然張恨水立足於章回小說的形式和通俗文學的娛樂性，[16] 可是書中半開放的結局狀態也說明作者容許讀者進行多角度解讀，就像本文把《啼笑因緣》解讀成寓言一樣，能藉此將它與新文學作品聯繫起來。實際上，《啼笑因緣》的成功，按張恨水本人的分析，在於打破了鴛蝴派的既定路線，既不包含肉感、武俠、神怪等內容，語言上又不是純白話。[17] 《啼笑因緣》的結局，也反映出它並沒有只同情沈鳳喜的命運，要是“將過錯罪惡推向惡社會和惡人就完了”[18] 的話，就沒有討論空間，這也反映了張恨水個人對市井文化的批判性，這種對下層的批判不見於其他鴛鴦蝴蝶派作品，五四作者中也只有老舍、魯迅筆下出現過類似內容，這種創新和含混性令張成為言情大家，也賦予了這部小說被後世研究者再評估、再研究的價值。

---

[15] Hockx, Michel. “*The Literary Field and the Field of Power：The Case of Modern China.*” Paragraph (Modern Critical Theory Group), vol. 35, no. 1, 2012, pp. 49–65.

[16]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 291-292。

[17] 張恨水：《我的寫作生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5。

[18]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 293。